

第二章 “中国留学生之父” ——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在传统中国如此的思想格局和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下,那些少数走出国门、走出中国文人学士一向身处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而踏上留学西方国家的道路,成为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那么,其一生的经历、境遇及命运如何,便是可以意料的了。

第一节 逸出群体的一个异数

1847年初,当“天朝上国”的统治者还未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的挫败中惊醒,还沉浸在“万年和约”的梦幻中,中国的文人学士还生活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精神世界里,还在殚精竭力地追求着科举仕途之时,却有一名不满19岁的中国青年,远涉重洋,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追求“无论大小精粗,多与中国文化背道而驰”^①的——西方文明。八年的留

^① 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人生的归宿》第89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美生涯,使他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先驱。他,就是容闳(Yung Wing)。

显然,容闳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截然不同的路。容闳之所以能超越群体而独辟蹊径,执著地追求以科学为内核的西方学术,可溯源于其初年的文化养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和对西方文化的接纳。

容闳 1828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与葡萄牙侵占的澳门相距很近,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 年,容闳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西塾”就读。当时只有 6、7 岁的顽劣幼童,对于为何进入“西塾”,尚“百思不得其故”^①。只是服从父母安排而已,即“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②。容闳幼年即入西方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明显地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家贫。当时人们一般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方传教士办的“西塾”去读书,因为学英语及有关基督教的知识,这在当时中国正统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③。只有“一心只读圣贤书”,才能“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士子公认的“光明正途”,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世代相袭的普遍信仰。因此,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大多希望子弟走科举正途。即便贫苦人家读不到参加科考的程度,也会竭尽全力供养子弟读一点“汉塾”,以求“知书达礼”。况且西学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人们普遍排斥和鄙视西人、西学。中国士绅文人更是普遍地对西方文化嗤之以鼻。因而,“西塾”对中国士绅家庭没有吸引力,而能够吸引的是那些家境贫寒,入仕无望的家庭:洋学

① ②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2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堂不收学费,而且免费供应食宿。所以在中国清代,这种免费教育的西塾即教会学校的最初名称是“义塾”或“义学”。如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的第一名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到达广州后,即在自己家里收留了几个穷孩子读书,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就是地道的乞丐。容闳父母在承担一个儿子读“旧塾”后,则难有能力再负担另一个儿子的读书。如1840年容闳父亡,“家无担石”^①,也足见其家境之清贫。

第二,得风气之先。澳门原属香山县境,但早在明嘉靖初年葡萄牙人即开始觊觎澳门,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船取得在澳门停靠的便利,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实现了进入澳门的目的。至1660年,居澳门之葡人已有1000人之多,从葡人登陆迨1835年的整整300年,澳门成了西方人来往穿梭于东西方的终点和始点站。虽然中国仍闭关锁国,而与澳门紧相毗连的容闳家乡,300年的西风西雨的吹拂沐浴,早已使当地人对“西方老番”及“西语西学”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当地人同西洋人打起交道,学西语,当翻译,做买卖,经商往来。尽管这些为中国保守的士绅文人所不齿,但这些实际利益对一般乡民是很有吸引力的,以致于他们能够较轻松地跨越中西文化的道德障碍,去接纳西方文化。贫苦的容闳父母就意识到,送容闳去“西塾”习西语西学,是很现实的选择。“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②可见,最先接触和接纳西方文化的,正是外国传教士足迹所至的、得风气之先的中国沿海口岸地区普通的农工商民。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4页。

^② 同上,第2页。

容闳在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上的第一个学校也是他开始识字读书的启蒙学校即是西方传教士办的洋学堂。这就是说,容闳自小就逸出了普通中国学童固定的成长模式。

正是童年“西塾”的启蒙教育,使容闳对西学产生了追求。容闳童年的路是曲折坎坷而奇特的。1835年至1840年间,澳门教会小学“因故停办”^①,容闳曾还家“从事汉文”^②。1840年夏秋之交到1841年,其父亡家更贫。在此期间,容闳除做农活外还做过提篮小卖,过着近似流浪儿的生活,后又在澳门天主教传教士办的英文印刷所当童工。令他意想不到的,1841年,玛礼逊学校又向他打开大门。但此时容闳当童工所挣的钱虽微薄,但对其家庭却是一大援助。因而,其母不同意他再去读书。“时予母方深资予助,闻言意颇不乐。”^③如果说当初是容闳父母作主送他去读“西塾”,那么这时容闳却能冲破家庭阻碍,自己去追求西语西学。而正是这一次的自我追求,赢得了他青年时代去西方接受完全西学教育的机会,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走与传统中国人不同的路。

1841年至1847年初,容闳便一直在玛礼逊学校读书。他之所以能够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顺利地读下去,而不为家贫所困,也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他个人的执著追求;其二,则是他资质聪明,深得玛礼逊学校教师勃朗等人的赏识,而愿意给他更多的援助,使他得以摆脱家庭困境而安心读书。如H·N·Shore在他所著的《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中说道:

有一位聪慧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

①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4页。

③ 同上,第6页。

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的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末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小孩领回。……有一人听到这事,保证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使小孩留在学校。他继续维持她的生活到十七年之久。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①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即使是那些非教会团体,也是借助传授知识,而达到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目的。如 1835 年 1 月,在广州的外侨发起组织非教会团体“玛礼逊教育会”在发起“通报”中写道:

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末,我们的后世将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②

就读于“玛礼逊教育会”学校的学生受基督教影响,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布朗的一份报告中即可见一斑:

我安排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钟开

① H·N·Shore《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1881 年伦敦出版,该文根据 Brown 博士 1877 年 9 月在天津演讲时提供的事实而作。引自《洋务运动》(八)第 419 页。

② 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4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场地上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的最好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家庭的早晚礼拜。简言之,我们是在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同在家里一样,给他们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①

在这种老师亦朋友,学校亦家庭的基督教氛围中,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师给予的一切。如容闳就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同学中有多少皈依了基督教,是否是全部,不得而知。而有案可稽的,黄胜和黄宽都是基督徒^②。特韦契耳(Joseph H. Twichell)牧师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耶鲁法律学院肯特俱乐部演讲时说,容闳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时成为基督徒的^③。美国汉学家柯文则认为,容闳可能是在玛礼逊学校时就皈依了基督教。^④

然而,勃朗与其他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所不同。他是基督徒,但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的。他在中国办学 8 年,他的身份是教员。他为玛礼逊学校的学生开设的课程除《圣经》和汉语外,还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和化学等课程。经过 3、4 年的学习,学生们能掌握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而中国传统教育则不然。英教士李提摩太认为,“中国学

① 《中国丛报》1841 年 10 月,第 569—570 页,引自顾长声《传教士近代中国》第 41 页。

②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 22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 2 页。

④ 同②,第 223 页。

校,法度之善,渊源之远,辟雍钟鼓,遗泽未湮,实非五洲各国所能企及”,但“学校之书,只知述古,自囿方隅,不能博通五洲,近达时务。”^① 用西方人的观点来考察中国传统教育,只会令西方人萌生大为惋惜之感,利玛窦则是其中之一。他说: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

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多少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本书里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为此目的,他必须背熟整部《四书》。^②

利玛窦评价说,在欧洲人看来,科举考试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或许有点无效的方法。因为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或数学或医学以及特别是哲学的考试,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以致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作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③

可以说,玛礼逊学校的学生所学的知识远比中国封建学塾儒生确实要丰富广阔得多。勃朗在传播其信仰的同时,也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有系统地传播西学的西方人,玛礼逊学校是向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后因师资缺乏、经费困难而

① 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卷八。新学,转引自朱维铮文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第2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②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1—41页,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于 1849 年停办。“继之而起的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式教会学校在香港和开放的五口陆续而设。”^①

正因为在玛礼逊学校学到了传统中国学塾所学不到的知识,容闳等中国孩童打开了眼界,萌生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欲望。如 1845 年在玛礼逊学校读书时,容闳曾作《意想之纽约游》一文,则体现了这位 17 岁中国青年学生的理想和追求。

让传统中国人迈出国门,去西方留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想不到,也不愿意这样想。即使是接受过西学教育的人,也不是都乐意远适异国,留学西方。当这种机会临头时,有的紧紧抓住,而有的则抱着脑袋躲开。如 1846 年秋,勃朗因健康缘故,^② 决定暂离中国而回美国。他布告生徒,“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③ 也许令勃朗感到意外,他的这些从小受西学熏染的学童,绝大多数竟不为所动。“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④ 不难看出,容闳、黄胜、黄宽这“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不仅学习成绩最好,而且传统束缚也应是最少的,不然,也会与班中其他同学一样滞留在国门内。对此,因资料的限制,仅以容闳为代表分析他们跨出国门的原因。

首先,容闳具有极强的自立能力和自立意识。容闳出身清苦,早年生活充满苦难艰辛,还在童稚时,便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4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当时因其妻病不得已而返美。

③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9 页。

任。这不仅使他比同龄孩子思想早熟,而且更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自立能力。他从小就体验到学习西学具有实用性。若能到美国去接受完全的西学教育,则更能为今后的谋生找到出路。

事实正是这样。当容闳在美国读书期间,他仍为家庭生计而操心 and 焦虑。容闳于 1847 年抵美入麻州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1849 年 4 月 15 日,他写信给在中国的美国卫三畏牧师(Samuel Wells Williams),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我写此信有一重大原因,仁慈热诚如您,而您的协助将影响我终生至巨。此一重大事项,即我恳请您给我哥哥 Yung Asum 觅一工作,此为我最渴望者。

另一要事即请您向我伯父 Yung Ming Cheong 面前求情,请他准我多留美国几年。我做此请求,目的是希望能受最佳教育(Best Education),而将来有最好的机会则取决于我现在能否留下来。这样,您必了解,我将无法照顾母亲、哥哥及妹妹。当我离开中国时,我答应他们两三年内,我一定回来。

众所周知,中国人充满偏见,因而坏事。他们无法如您或其他开明人士来观察事物,他们反对受教育的好处,他们在脑海中满是迷信和无知。

因此,假如我必须留下,我请求您和我伯父商谈,尽力使他相信,我再多留在此地几年,受了教育的结果,请尽力说明一个美好的远景,为什么知识会增进幸运,我以后的日子会怎样,如果我还活着的话,请您先同他讲好,然后才有向家母进言的机会。如果我哥哥有了工作,则我留下的情形较易,而且也可资助我幼弟去读书。^①

① 容闳 1849 年 4 月 15 日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此资料由美国康州高宗鲁教授提供。

可见,容闳把接受西学教育与增进幸运及好的机遇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他赴美前及留美后最初二年的认识。

第二,容闳有勇于探险的精神。容闳自小学习西学,但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西方世界。对容闳来说,真实的西方世界仍是个谜,是个充满神奇的世界。清贫、苦难铸造了他自立的意识,也赋予了他勇于探险的精神。大洋彼岸的遨游,是他的夙愿和梦想。勃朗为他提供了实现这一夙愿和梦想的机会。

第三,容闳对仕途无望。容闳至留美前,所习汉文极为有限,“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①以至日后他留美归国时,竟不能作中国语。微不足道的汉文基础远不能使他有望去“科举取士”。何况,对于几乎是完全接受了西学教育而长大的容闳来说,他没有儒学资本走科举正途。同时他对科举不会有兴趣,因为他的兴趣、观念和人格都早已与传统中国文化人不同。

第四,赴美留学经费有着落。勃朗在未宣布赴美前,已与校董妥筹办法,为留美生募集资金。资助者是西方人,他们是香港《中国日报》(China Mail)主笔、苏格兰人蓄德鲁牧(Andrew Shortrede)、美商李企(Ritchie)、苏格兰人康白尔(Campell)等人。资助留学期限为二年。而且,留美生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赡养。另外,赴美船费也被免去。美国纽约巨商兄弟三人开设的阿立芬特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让他们免费乘船赴美。如果没有上述这些资助,容闳留学之志是难以实现的。如他自己所说,“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斧,则无米安能为炊。”^②

第五,容闳信仰基督教。容闳自学龄儿童入“西塾”起,便深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9页。

② 同上,第10页。

受基督徒人格的影响。他一生中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Mrs. Gutzlaff)。古夫人和蔼仁厚的形象,容闳“视之若母矣”^①。古夫人给童年的容闳留下的印象是终生的。“时才七龄,当时情形,深印脑中,今虽事隔数十年,犹能记忆。”^②这位母亲般的老师,在“西塾”停办赴美时,把容闳托付于传教士霍白生医生(Dr. Hobson),谓必访得容闳所在,俟玛礼逊学校开课时送他入校。霍氏负此宿诺,无日或忘。当容闳得知又能读“西塾”时,兴奋异常,认为“上帝又似命予速往勿失时机者。”^③童年的容闳从这些基督徒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可亲可信的人格魅力。从而在其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为这一人格留下了一方位置。至于勃朗——在玛礼逊学校与容闳相伴六年的师长,容闳对他的人格特征有如下的归纳:

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此虽由于赋性聪敏,要亦阅历所致。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④

因而,当勃朗决定离华返美时,其他学生均“爽然如有所失”,“愀然不乐”,对勃朗先生十分留恋。而容闳却很高兴,因为他已拿定主意将跟随勃朗一块离华赴美。无疑地,勃朗的人格魅力,对少年容闳必具强烈的吸引力。容闳的经历表明,容闳不

①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页。

③ ④ 同上,第5页。

仅在信仰上认同于勃朗,而且在学历上也是认同的,他一心向往和追求耶鲁大学,也难说不与勃朗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有关。勃朗不仅携带容闳赴美留学,而且容闳留美8年的资斧,都是由勃朗竭尽全力募集的,特别是容闳上耶鲁大学的经费的筹集,使容闳从山穷水尽转为柳暗花明。容闳在给1876年出世的头生子洗礼命名为玛礼逊·勃朗(Morrison·Brown),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即纪念玛礼逊(英国牧师)及勃朗博士二人也”。^①容闳对勃朗人格的认同而产生的好感及信赖远超于单纯的师生之间的情谊。另外,无论容闳何时信奉基督教,都可以说,容闳的基督教信仰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是基督教人格长期陶冶熏染的结果。可以说,容闳随勃朗赴美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督教人格的认同。

概而言之,中国文化传统已没有多少能对容闳产生效应。容闳除拥有贫寒,唯一的牵挂就是其寡母。而其母身边尚有兄弟诸人“承欢膝下,不使寂寞。”^②对于主意已决的容闳来说,这为摆脱唯一的束缚——“父母在,不远游”,找到了借口。容闳初年的文化养成,使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人格。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和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使他更加执著热烈地追求完全的西方教育。容闳不同于那些走着“儒学取士”之路的传统中国文化人,也不同于那些走着“神学传道”之路的中国神学留学生;容闳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玛礼逊学校的其他同学,容闳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终成为逸出群体的一个异数。

① 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58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页。

第二节 容闳的边缘人人格

若把处于两种文化交界处,远离某一文化中心的人称作“边缘人”^①,那么,可以说,容闳初年的文化养成就已使他成为一个边缘人:他身处澳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点,以学习西学为主,远离正统儒学这一文化中心。然而,当他作为一名中国青年,赴美国留学后,无疑,他则成了一名无可非议的边缘人。关于边缘人的具体涵义,可从美籍华人许烺光的自白中得到进一步的领悟:

我是一个“边缘人”。我出生并成长于一种文化环境中——在那里,生活停滞,大部分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可以预知,后来我被从这一文化中赶了出来,到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后一种文化中,人们渴望变化,因为它本来就追求进步,万物与众生的面貌总是变动不居的。处在对比如此明显的两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本来就徘徊于每种文化的边缘。他自己就像是漫步于这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两个人一样,时常接触,……^②

如果说赴美留学前的容闳尚未意识到自己是同时生活于两种文化之间,而这两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是彼此冲突和对立的,尚没有因介于两种不同文化而遭受情感上的折磨,远涉重洋之举,只是单纯地为满足个人的求学之志,那么,当他真正地远离祖国,而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后,他则感受到了自

① 叶南客著:《边际人》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② [美]许烺光著:《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自序第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

已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变化,深刻地“体会出两种不同文化面在内心相互磨擦的边界”^①,祖国的意识愈加鲜明强烈,置身于异国他乡的他,终于在留学期间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心理分析认为,一个人生平的整个过去,从他落地的那天起,就时刻不离地随着他;早年的“渴望”与“寻找”,无疑地是他后来思想的滥觞。出身贫寒和卑微家庭的容闳,早年苦寒的岁月会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浓厚的阴影。他祈盼过上好日子。西方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理想——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穷人富人的平等互爱的意识,与容闳的祈望和寻找具有同向性。自幼就生活于基督教环境下的他会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

然而,他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中国人的鲜血。本位文化的潜在影响,使他面对祖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也同样会在稚嫩的心灵中自觉不自觉地孕育出“朦胧”的民族自尊。这种对祖国模糊朦胧的情感,以至他本人也无法清醒地意识到,但是,潜入他意识的最深层的早年生活记忆和情结,常常会在外物的触及下,有意或无意地经过变形后再生。

触及容闳心灵的外物是美国的先进文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发达的经济文化。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平民百姓几乎都抱着一种原始的被公认为是正义的信仰,即“人要忠心”。臣民对君主主要忠心,平民对官绅要忠心,仆人对主人要忠心。即使卑微贫寒,遭遇种种人生痛苦与压制,也不憎恨社会,也不抱怨命运,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社会与制度。而能够意识到封建专制社会黑暗和不公的,只能是那些真

^① 许烺光著,徐德隆译:《中国人与美国人》,台湾巨流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0 页。

正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的人。如果说容闳早年受西学知识的启迪而冲出了国门,那么,当他真实地生活于蒸蒸日上的具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美国时,他的心灵所受到的震撼使他的思索范围从自我延伸到了祖国。对此,他说: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①

走出国门,离开本土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环境,容闳能够处于中国社会之外,来观察和透视中国社会,同时对中西方两种社会与文化进行比较;初年的文化养成,本来就使他较少具有本土文化为中心的观点,观察和比较的结果,他看到了自己与置身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背着传统重负的中国人的巨大差异。他的结论是,中西方社会之间的贫弱与富强、专制与民主的鲜明对比,就在于西方社会有西方文明,而中国没有,中国人的麻木无知,也在于缺乏西方文明教育。西方先进文明,唤起了容闳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的根本怀疑。用西方文明灌输中国,是使中国从贫穷、落后变为文明富强的最好办法,也是唤醒专制下的臣民抛弃臣民心理,做自己的主人之最好药方。清醒的容闳是痛苦的,但痛苦而不悲观。他深感“此身负荷极重”,并坚信用西方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2—23页。

进文明能够拯救中国。目标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正如容闳在自传中说的：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①

容闳早年的记忆或遭遇，在他心灵的调色板上，留下一缕淡淡的“祈望”或“寻找”色彩。当他置身于基督教环境下，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理想为那“祈望”和“寻找”的画案增添了浓浓的色彩，而一旦生活于美国社会，接受完全的西方先进文明教育，西方现代文明使那“祈望”和“寻找”的画面得以定型，高高地悬挂在他理想的峰巅上——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才能拯救中国，才能使像他一样的出身贫寒卑微的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早年的生活记忆和情结，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触及下，终于经过变形后复生。

边缘人在认同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同时，其身处的现实环境又不断提醒其本土背景，导致边缘人在文化归宿感上出现两歧性，即一方面是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一方面民族主义感情日益强烈。可以说，边缘人具有双重人格。这在近代中国留学生先驱容闳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3页。

首先,容闳是一个“西化”了的中国人,他具有真挚的基督教精神。何谓“西化”?即是指随文化接触而起的变化。^①对此,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学教授汪一驹先生阐释道:

当我们说:某一中国人“西化”了,并不意味着这位中国人已经真的变成了西洋人。相反地,是指因为其西方经验,他已经脱离了中国的典范,换言之,西化的结果很可以说是一种行为式样,多少带点中西文化痕迹,但却又不中不西。^②

关于容闳的“西化”过程,容闳的美国朋友曾有生动的描述:容闳初入美国时,他的国籍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剪掉了辫子,脱下了中国长袍,而且他在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③。事实上,他于大学期间(1852年)即加入了美国籍,成为一个美国公民。

容闳一生中有种种梦想,但其中两个主要心愿则是:“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④“援西入中”和“娶美妇为妻”仅这二项在当时就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不仅如此,容闳还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认为是国教的——儒学,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从以下的观点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容闳在美国的中学——孟松学校校董曾以毕业后必须回中国充当传教士为条件,资送容闳入大学,但遭到在经济上已山穷

①② 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第11页,台湾枫城出版社1978年版。

③ 吐依曲尔:《吐依曲尔之演讲》,前引容闳书“代跋”第6—7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页。

水尽的容闳的拒绝。容闳拒绝的理由是：

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①

容闳认为，传教固然是一项好事业，只是它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中国人不信仰基督教，对中国人传教只能是“有用之身，必致无用。”^②寥寥数语，足以反衬出容闳不是个“信力薄弱之人”，而是具备了完全基督教人格的人。

其次，容闳具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和民族精神。容闳站在西方人的视角上来观察中国社会，但他比西方人了解中国。他坚持对传教于中国无效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懂得：“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与中国文化并未曾完全地融合过，统领中国的虔诚教徒实际上仍为传统儒学与社会习尚。”^③但是西方人坚持容闳回国传道。那些资助容闳留学的人更是担心他“久居不归”，“乐不思蜀”^④，希望他学成归国“热心传道，使中国信仰上帝，人人为耶稣教徒耳。”^⑤然而，容闳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把自己逼上了绝境。对此，特韦契耳(Joseph H·Twichell)牧师说：

他的朋友和公众都认为他会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牧师。然而，就在此时此地，(容闳——笔者注)虽然一点也不怀疑基督教传道会的价值，并充分认识到他自身也就是传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0页。

② 同上，自序第1页。

③ 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第19页，台湾枫城出版社1978年版。

④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4页。

道会工作的直接的成果(这要永远记住: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却以在他那种年龄就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①

基于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了解,容闳的结论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科学。这也是容闳拒绝当传教士的真正原因。因而,贫穷改变不了其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说: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②

因此,当他努力地考上了耶鲁大学后,他唯有的只是一种精神。1850年他给卫三畏的信中则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境界。他说:

享受大学生生活,我想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要有不屈的精力和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③

容闳一边在刻苦学习,一边在思考选择何种职业最有益于祖国。1852年容闳在读大学二年级,他在该年12月30日给卫三畏的信中已表露了这样的思想,并与选择将来的职业一事联系起来。他说:

如果我能活到1854年(咸丰四年)夏天,我将得到B. A. 学位(即文学士学位——笔者注)。然后我将回国,再去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5页。

② 同上,第19—20页。

③ 容闳1850年圣诞节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此资料由美国康州高宗鲁教授提供。

考虑我的职业。

关于我的职业,我尚无决定。但有一事可确定,我将去学农业化学,也可能去学内科和外科医学。对于一个决心为国家效力的人来说,各种不同学科,都是一样重要。分门别类,因此,实在难于抉择。^①

但是他始终没有选定上述的某一行职业。显然,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意识到,要改革中国,使中国通过现代化而富强起来,他独自一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必须把眼光从自己转向更多的中国青年,就是要把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造就成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的现代化人才,以维新中国,使中国文明富强起来。这便是他的派遣中国留学生计划的由来。他的美国老友特韦契尔也说,容闳当时曾与美国同学讨论过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生计划^②。

他在整个大学期间,一面学习西方文化,一面关心中国问题。如他曾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关于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文章,使他流露出“经国之才”,而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赏识^③。

然而,对于重返本土后的前途和命运,容闳不是没有顾虑的。正如他的美国友人所说:

一个像他这样的“西化”的人,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似的在他耳边萦绕盘旋。那条经文说道:“不论是谁,如果不

① 容闳 1852 年 12 月 30 日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此资料由美国康州高宗鲁先生提供。

② ③ 吐依曲尔:《吐依曲尔之演讲》,容闳书“代跋”第 6—7 页。

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活像是从整个民族中选拔出来领受这份恩泽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①

在容闳身上,双重人格都表现得异常强烈而淋漓尽致:他一面加入美国籍,成为一个美国人,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而另一面中国人的意识又异常强烈,时刻准备着回国服务。而正是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背景,使容闳难以彻底归化于西方社会,而成为一个“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中国人。^②

其实,关于边缘人的人格特性,容闳自己有最精当最真挚的表白,他在自传中写道:

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③

容闳为了中国而回到了中国,但是他是带着去受苦受难、去异乡流浪的精神准备回到中国的。超越常人的精神境界,使他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代跋”第7—8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代跋”第15页。

③ 同上,“自序”。

一开始就选择了苦难和孤独。出身贫寒的容闳,从小养成了不怕吃苦的品格,西方先进文明的陶铸,更使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可以说,容闳带着孤独的精神回国,但他的精神又是充实的,在他的心中装着一个中国,装着整整一个民族。他相信,他自己总会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民族。容闳回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自觉自愿的,是带着明确的使命归国的,就是把中国从封建专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使之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带着反中国即反封建专制的目的回到中国的,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叛逆者的角色。

第三节 在依附中寻求“援西入中”

《礼记·曲礼》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传播西学的先驱者——西方传教士深谙中国这一古老之礼法。如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玛窦抵中国后,则处处附会于中国本土文化:穿中国服装,学中国语言,说中国话,投中国皇帝及官绅所好,甚至为满足中国人的“华夏中心”的特有心理,把中国画在世界地图的中央等等。如果说利玛窦在西学传播方面有所建树,那么首先得助于其个人生活与传播内容都附会于中国本土文化。而一旦西方传教士逆中国传统习俗背离中国本土文化,如禁止中国人祭祖祭天,则遭到中国皇帝的驱逐,导致西学东渐涓涓细流的中止。纵观明末以来的百年的西学东渐,不难得出一个道理,即西学的传播者,只有附会于中国本土文化,在中国确立相应的发言位置,取得相应的发言资格,才有可能进行其有关的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如此,那么,留学异邦的中国人重返本土后还会被视作外来人吗?还需要谋求发言资格吗?

众所周知,这在以华夏为中心的近代中国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作为近代中国留学生先驱的容闳重返本土后的种种遭遇和经历,首先肯定了这一答案。

1855年初,已不能作中国语的容闳带着“中国反倒像异乡”的第一印象重返故土。本土文化背景一开始就提醒他回到祖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摆脱“外来人”的角色身份,进而寻求进入本土文化的渠道。如去见母亲时,因一时无从易中国衣,才仍着西装;母亲见容闳已蓄须,上有一兄尚未蓄须,故意欲容闳去须为佳。对此,容闳有精彩的记载:“予闻言,即如命趋出,召匠立剃之。母见予状,乐乃益甚。察其意以为吾子虽受外国教育,固未失其中国固有之道德,仍能尽孝于亲也。”^① 当介绍在美国的学习,则特别强调“美国之学士,盖与中国之秀才相仿”;紧接着,他又全力补习汉文;同时,在美国剪掉的发辫又被重新留了起来。可以说在基本生活方面,容闳竭力与本土文化融合,但由于他自小即与本土文化传统疏离,所以在与本土文化融合方面,其作为是有限的。然而,不只是受初年文化养成的限制,异域成长的背景,更成为烙在他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重返本土后寻求相应的发言位置的努力充满了坎坷。

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士人的生命基调是仕。取仕即取得经世济民的资格,通过经世济民而奠立仕子的生命意义。这是正统儒学的核心,这也铸就了传统士人的人格形象——依附性人格,即以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为代价而换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为。身为中国人的容闳深谙其理,要在中国有所作为,就得走中国之路。因此,他一回国,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附会于本土文化,而且也竭力在政治生活方面寻求依附:结识达官或被政府录用,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29页。

取得“仕人”的相应的发言资格,以便递交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进而实现他的“援西入中”、复兴中国的理想。

他回国不久即在广州为美国人派克(Hon·Peter Parker)当私人秘书。派克曾是奉美国教会之命来华传道的医学博士,在华悬壶多年。时为美国政府驻中国的特派员。容闳说:

予在派克处,事少薪薄,月十五金耳。予乐就之。意本不在金钱,欲借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①

但摄美国公使之职的派克,未能为容闳叩开希望之门。容闳拥有的“在美国人犹视为荣誉”的美国一流大学的文凭,在中国正统社会却是受到鄙视的。从1855年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容闳一直游离于中国官方控制和正统社会之外,徘徊于中、西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先在广州跟美国传教士补习中文,后为美国公使作文书;在香港随英国律师学习法律;在上海居于租界内,作过海关翻译;又为某洋行作茶叶经理人,等等。他或置身于西人圈,或交游于商业界,在中国士人圈内,也只与少数志趣相投者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实学名士有交往。容闳曾向他们敞开胸怀,谈自己“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的抱负,但其出身背景把他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士人相隔离,被中国正统社会所排斥。后来容闳向勃朗(Brown)博士描述他的这个时期,称它为“黑暗时期”。那时,他看不见实现他的计划的希望。^②容闳为了中国而回到中国。他本来就是带着来受苦受难来异乡流浪的精神准备回到中国的。因而,尽管回国屡经挫折,遭遇的尽是难以言状的黑暗和污秽,但他以“基督般的忍耐”,仍在等待和寻找着报国的机会。勃朗博士后来在回忆中谈到容闳这时期的思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2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20页。

想状态。

容闳回国后在上海颠地洋行(Messrs Dent)任茶叶经理人期间,勃朗恰巧去访问了他。当他一走进容闳的居室,“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与同公司的其他中国雇员不同,而感到惊奇与愉快。这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居室看出来的,因为其他中国雇员的居室的特征仍然是肮脏和臭味,而容闳的屋子是整洁的典范,桌子上放了一些最美好的英文书,书架上排的书更多了,又有经典的著作还放在桌子上;但是他对于最后可能实现他的计划一点,却未曾失望;他的计划通过这一切——从他看来似乎是他生活的黑暗时代的一切——他改进了并发展了他的心思,并为着一个伟大的将来作了准备。这伟大的将来在等待着他。”^①容闳等到了机会,他等到了清政府的“自强”。

当历史进入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清政府对峙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持续达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已经腐朽的清朝统治机器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的“万年和约”的迷梦。中国这具与外界隔绝的“木乃伊”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近20年的“风化”,已面临“解体”的危机。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最高阶层和一批务实开明的封疆大吏终于开始正视形势及西方列强。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掌朝廷行政实权的奕訢,1861年1月13日在《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对形势作如下估计:

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

^① 《洋务运动》(八)第420页。

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①

李鸿章 1860 年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夷人及形势分析道:

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②

在经历了创巨痛深的千古未有的打击后,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现实,自强御侮开始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共识。“稍变成法”的革新思想开始蔚为一种社会思潮。由魏源于鸦片战争期间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经过 20 年的沉寂,终于具体化为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洋务实践。持续 30 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国策,以学习、吸收西方的器物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内容,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即学习西方列强的器利兵强的长技,使自己达到能与对方匹敌以致制胜对方的程度。虽然从 70 年代起开始从办军用工业求强过渡到办民用工业求富,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自强”的目标则是追求“利器强兵”,即“中国文武制度

①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6 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洋务运动》(一),第 41—42 页。

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惟独火器万不能及。”^①但这毕竟在特定方面大胆公开地承认了“华夏”不如“外夷”，认识到“用夷变夏”的必要性及迫切性，比起传统的“天下”意识和“华夷之辨”观念，显然有了一定的超越。

曾国藩是“自强”实践的领头雁。他在1861年攻陷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驻节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招募国内科技人才，仿造西洋军火、轮船，成为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肇始。出于国家安危之虑，曾国藩甘冒越俎代庖之险。如他曾敦促李鸿章尽早打开“自强”局面：

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行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②

办洋务最急切需要的是洋务人才，曾国藩等洋务大僚莫不以遍览天下人才为要务。如在曾国藩幕府中，“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③但最感缺乏的是西式人才。容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如果说，曾国藩为办洋务，紧紧地抓住了容闳这位当时中国罕有的西式人才，不如说是容闳为了他的魂梦不忘的教育计划，而紧紧地抓住了曾国藩这位达官显宦。容闳自传中说，他是在1863年因曾国藩的多次邀请和催促下才去安庆的，而曾之所以邀请他是由于李善兰、张斯桂等旧友的屡次向曾推荐。其实，他早在1862年就去过安庆。在对太平天国失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② 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21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4页。

望后,他就把希望寄托于洋务派。可以说,他是多方设法,主动攀上曾国藩的关系的。^①这可从曾国藩于1863年上半年致郭嵩焘的信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容纯浦上年(1862年——笔者注)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此间如华若汀、徐雪林、龚春海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费多金以往,请即薪之少荃,虽数万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②

从上述可以看出两点事实:第一,当时曾国藩迫切需要西式人才,因而,容闳一到安庆,就被曾国藩“借重”。第二,从1862年第一次赴安庆至1863年秋赴美国购买机器前的这段时间,容闳一直在为曾国藩招徕洋工洋匠。即使于1863年出洋购买机器,也兼有招徕洋人的使命。容闳在自传中隐去了这一细节,如果不是容闳晚年记忆上的失误,那么,其中难言之隐也许正是容闳想隐去主动依附于曾国藩这一事实。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容闳回国后,虽然一直被排斥在正统社会之外,但他对清政府仍抱有幻想。直到1860年,他才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他主动探访太平天国即是最好的例证。

西方列强继1840年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后,时隔20年,再次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皇帝的宫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直捣清王朝的心脏,皇帝魂飞魄散,狼狈逃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遭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剪辑》第三册,第228页。

②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

受更大的耻辱和灾难,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都会为此而痛心疾首。就在清廷百依百顺地在列强事先拟好的《北京条约》上签字之后的十多天,即1860年11月6日,容闳投奔了太平天国。

容闳寄希望于太平天国,有三个原因促成:第一,太平天国文化排它性较弱,且奉行耶稣教的特点,与容闳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使容闳比较容易对它产生同情。从1851年至1860年,占据江南与清廷对峙近十年的太平天国,大有吞噬清王朝取而代之之势;第二,容闳于1856年在香港与洪仁玕相识,1859年洪仁玕离港抵天京(即南京),受封干王。1860年正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第三,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更加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本质,“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①缘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而爆发出来的压抑太久的反政府的情绪,是容闳转向太平天国的根本原因。容闳表白道:

南京之行,本希望于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措手,可以为中国福也。^②

可见,在中华民族惨遭危难之际,救国心切的容闳,对太平天国政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然而,实地访察太平天国,令容闳大为失望。他感到太平天国“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③。不过,容闳也给予太平天国一个肯定的评价,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④

综上所述,容闳主动攀缘上曾国藩,但容闳与曾国藩在文化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页。

② ③ 同上,第62—63页。

④ 同上,第63页。

养成、社会地位、价值观、个人抱负等诸多方面是如此大异其趣：前者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接受完全西方文明教育、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一流大学学位的西式知识分子；后者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内圣外王的儒学典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军。不过，容闳通过与曾国藩接触，认为他与众不同，比中国其他官吏都优秀，实为楷模。“可称完全之君子，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①，是“足以谋中国现代化的人”^②。曾国藩的“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的威权，正是容闳实现其教育计划的政治基础。容闳深知，在封建专制的氛围中，自己的希望过奢，志向过高，很难见诸实行。孤军奋战也将使梦想成为遥遥无期的幻想。总之，结识曾国藩，得曾国藩之伟力，犹如久遭干旱的禾苗，突逢雨露，容闳视之为良好机缘，则足以表达他当时的喜出望外的心情，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有文正其人为予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③

然而，容闳并没有陶醉。容闳是一个梦想者，但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相信清政府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其腐朽的本质，不相信科举正途出身的洋务官僚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观念上根本性的转变，也不相信自己因依附于曾国藩而在一夜之间会将梦想变成现实。因而，入曾幕后，他并没有急于提交自己的教育计划，而是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竭力襄助曾国藩筹办机器厂，以取得相应的发言位置和发言资格。而在扮演依附型的角色的过程中，容闳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建议先发展基础工业，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启动。曾国

①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1页。

③ 同上，第70页。

藩于1861年在安庆设立的内军械所与1862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炮局及相继设立的苏州炮局,规模小,设备简陋,完全不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1863年,曾国藩有建立“西式机器厂”之意。容闳则建议办“制器之器”的“机器母厂”,建立一切制造厂的基础,即建立中国的基础工业。这一建议,深得曾国藩的赞成,于是,“制器之器”,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笔下口中的新名词,容闳也被委以全权出洋购买“制器之器”^①。1863年秋至1865年夏,容闳从美国购回一套当时最先进的“制器之器”,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基础工业基础——江南制造局。对此,曾国藩甚为满意,并为容闳专折请奖授五品实官。此后,曾国藩对容闳甚为倚重,可从他给丁日昌的信中看出:

徐委员(寿)所造轮船,独开生面,容委员(闳)所购机器与阁下所得虹口铁厂,其事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亦即为中国可造之才,惟须阁下主持调护……^②

容闳结识曾国藩,进而结识江南制造总局督办丁日昌,其后丁任上海道、盐运使及江苏巡抚,两人交谊日密。1865年10月,容闳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任译员,不久丁升为江苏巡抚,容也借丁之力,旋得加衔而带花翎。容闳真正走上中国之路——仕途。取得了发言位置的容闳更显示出其主动性。

其次,建议设立兵工学校,最早将实业教育付诸实践。1867年,李鸿章、曾国藩平定捻军。曾国藩赴南京任两江总督前,首次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他参观由美购回的机器运作,曾氏“见之大乐”,乘此机会,容闳建议在厂旁设立兵工学校,招生徒肄业,授以机器工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十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② 《复丁雨生都转》,《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64—265页。

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氏极为赞许,遂设立制造总局兵工学校,造就了大批机械工程人才。左宗棠、沈葆楨 1866 年在马尾船厂开工前,即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求是堂艺局,1868 年迁入刚建好的马尾船厂,这是先见之举。但最早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当数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另外,1867 年,江南总局内还设翻译馆。容闳自传中虽未提及,但有资料表明,这也是由于容闳倡议而设。“十余年间,译书一百余种,区区一局,遂成洋务之重镇,遗爱无穷,纯甫之力耳。”^① 尤其是该局编纂《西国近事汇编》,自 1873 年至 1899 年间,每年 4 册,计出 108 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国情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具有较大的影响^②。可以说,容闳诸项建议的付诸实施,这给他进一步尝试“教育计划”带来信心和胆略。

第三,提交包括教育计划在内的开创性的四条建议。在洋务官僚中,容闳视曾国藩及丁日昌为知己,而最密切者为丁日昌。丁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积极实践者,是洋务事业中的杰出人才。曾任两广总督的毛鸿宾于同治三年(1864 年)在请录用丁日昌摺中说:“丁日昌学术湛深,才识出众,非徒以火器见长。”^③ 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是:“丁日昌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④ 沈葆楨评价丁日昌“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

① 梦山楼:《同光风云录》,见《容闳传记资料》(一)第 8 页,台北 1979 年 8 月版。

②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 38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毛鸿宾:《请录用丁日昌片》,同治三年十月十五日,《毛尚书奏稿》卷十一,第 22 页。

④ 同治二年九月初四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第 13 页。

务,罕出其右者”。^① 在洋务事业中,李鸿章就受丁日昌影响较多,薛福成认为,李鸿章“采用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洋人奥闕。”^② 容闳也认为,“丁为一具有进步倾向之人,且勇于实行一切改革之措施。”^③ 1868年,容闳向丁谈及教育计划,丁大为赞许,促“速具详细说贴”,容闳撰为条陈四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此条陈除第四条外,其余三条均为国家现代化启动的基本内容。容闳将条陈寄呈丁日昌,由丁转寄北京。此条陈是否转奏或下落如何不得而知,但结果是令容闳“希望几绝”。不过,走中国路的容闳,犹如狩猎者全神贯注等待着猎物一样,在自己取得的相应的发言位置上,不放过一个发言机会。1870年,他以“天津教案”为契机,促使派遣留学生计划变成现实。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名钦差大臣,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为翻译。他趁大僚聚集之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答应与李鸿章联衔上奏,请求清政府旨准。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④ 不久,清政府“着照所请”。容闳的教育计划,

① 光绪元年八月十八日,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洋务运动》(五)第173页。

② 薛福成:《庸庵文续篇》卷下第19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5页,[附一]第4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0页。

成为事实。

追求目标的过程是漫长的,而目标的实现往往只是瞬间。清政府及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会同意派留学生?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适应“大变局”的改革开放形势,以解决外交人员紧缺的问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则使用广州、澳门一带自发出现的一些懂西方语言的商人、买办作通事,但这只是一时之用,根本意识不到有目的培养一批西学翻译人才的必要。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涉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乾隆朝才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而俄文馆也形同虚设,一直被“视为具文,未能通晓”^① 俄语。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交涉增多,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立的《天津条约》中,已有专条规定:以后外交文件“总以英文为正文”,待中国选派学生学会英文,即不附中文本。随着公使驻京,总理衙门设置,直接交涉常规化、频繁化的现实,使语言沟通成为当务之急。为应急计,清政府及洋务官僚不得不聘用洋人作通事,但聘用洋人存在很多弊端,如聘用洋人耗资甚巨,还常遭洋人蒙骗耍弄等等。李鸿章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② 奕訢等人深感“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③ 同时,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1,第 24 页,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訢等奏。

②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 139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1,第 24 页,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訢等奏。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赏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①认为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非常必要。因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的同时,奕訢等人奏请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与此同时,江苏巡抚李鸿章亦奏请“仿照同文馆之例”^②,在上海、广州设立“广方言馆”。这些学馆主要教授外国语言文字,讲解各国社会情形,以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为目的。但这些学馆只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因此,在清政府急需一批善于与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的情势下,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培养一批高级外交人才,则为清政府所允准。

第二,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僚迫切需要一批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科技人才。洋务事业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逆传统而行的崭新事业。它一开始就与世界现代文明因素联系在一起,但要在缺乏现代文明的荒芜之地立足和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最急需解决的就是西学人才的匮乏。李鸿章认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③,而“尤以人才为急要”^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症结就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殫莫究,病在无人。”^⑤洋务大僚一开始就把培养科技人才看成是兴办洋务事业的“身心性命”。因此,在设立外语学馆以培养外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30页,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摺。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国史本传》卷首第23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2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3页。

交人员的同时,洋务官僚还相继兴办起各类实业学堂,以培养科技人才。此外,还向社会招募人才。但人才问题依旧很严重。首先,从学堂学生状况来看,普遍文化基础较差,清代闭关锁国,西学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加上“华夷之辨”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存在以及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所激起的民族情绪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普遍排斥和鄙视西人、西学,正统儒学子弟鄙视“师事夷人”的洋务学堂。迫于生源困难,洋务学堂大多招收资质较差的贫苦子弟入学,但这些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①这样,给洋务学堂带来严重负担:由传授专门实用技术变为兼顾文化基础教育,严重地拖延了人才培养的时间,同时聘用洋教习,也弊端重重,如不一定水平高,“每有不传之秘”,也必不肯倾囊相授。这些缺陷的存在,难以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其次,从招募的才源看,也存在种种弊端,如除少数精通西学外,大多仅为粗通,缺少科技理论,难以胜任现代工业对人才的要求,等等。总之,无论是社会招募还是学堂培养,才源仍然有限。要保证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动力的洋务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卓有成效,只有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

第三,“师夷长技”的认识和方式发生转变:由器的仿造到人的培养即由购买仿造西洋船械转变为培养西式人才。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标志着西方文化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封建教育的神圣殿堂,也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宣布吸收西方文化的开始。面对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由最初的惊惶失措和茫然无知,转而学习西方,借法自强——购买、仿造西洋船械。然而,实践证明,这不是根本的办法,这只是被动

^① 《李肃毅伯奏议》卷9,第85页,光绪年间石印本。

地吸收西方文化,难以真正地学到西学的精髓。因为“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① 奕訢上摺道:“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补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② 李鸿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日新月异……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之作计络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③ 有形的机器设备可以引进,但蕴藏在机器中的无形的科学技术知识是不会随着机器一起引进来的,它是需要人去学习掌握的。但派遣留学生去西方国家学习,则是清朝廷从来未有之事。敢于打破先例,提出先见之明,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的。

最早提出派遣留学生想法的却是一位卑职低之小官吏——拣选知县桂文灿。他奏陈道:“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引之。纵不必遣人远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④ 对此,奕訢表示赞同,他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只是“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尚未尽合机宜”。^⑤可见,1863年桂文灿和奕訢都有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① 《洋务运动》(二)第167页。

②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60页。

③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第400页。

④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页。

据李鸿章的说法,他也早有派遣留学生之意,只是未敢为天下先。如1865年总理衙门奕訢密商李鸿章派旗兵赴外国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李鸿章说,派人出国学习“以理与势观之,亦为将来必有之举,鸿章盖尝默存此见而未敢倡为是论”,“窃谓此事若行,似不至于流弊之太多。”^①但他认为:“今日讲求制造,亦不出两途:一则派人前往从学,一则开局延请教师”,他主张“先设局学习,稍有所得,不妨派人前往外国一为考验。”^②可见,奕訢、李鸿章早把派遣留学生看作“将来必有之举”。这正是容闳教育计划得以付诸实施的重要原因。

第四,19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第一次世界性的出访,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先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訢倡导的对外笼络政策真正成为清政府的国策,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关系出现所谓“友好”、“合作”的关系,中西文化交往也“似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1866年3月26日,经赫德建议,清政府终于正式派出了由官员斌椿率领的第一个出国考察团,游历欧洲各国。紧随其后的是“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各国,即1867年11月26日,清政府派志刚、孙家谷随美国人蒲安臣赴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是清朝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派遣正式外交使团。前后两个访问团的出访,至少使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正像曾、李二人在联衔奏折中指出的:斌椿、志刚、孙家谷等人出访欧美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今中国欲仿

① 李鸿章致总署函,见《海防档,机器局》(二)第13页。(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57年版。

② 同上,第18—20页。

其意而精通其法,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①同时,在1868年7月,蒲安臣以中国“钦差大臣”的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中有专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②不仅中美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而且西方国家之间也是通过互派留学生掌握先进技术,回国后“分科传授,精益求精”,这是他们富强的“身心性命”^③如临近岛国日本也早已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师习各艺”,“我国家亦宜行之”^④。总之,中国第一次世界性的出访,已“导之先路”,使清朝廷长了见识:出国留洋“尚非甚难之事”^⑤。

第五,1870年“天津教案”成为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最直接的诱因。1863年桂文灿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办法,奕訢虽表赞同,但认为条件尚不成熟。1865年,奕訢仍担心“流弊太多”,李鸿章则主张先在国内培养出有一定基础的人,再派出去。1865年,薛福成又向曾国藩提及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⑥此建议也未激起任何浪花。自1868年到1870年“天津

①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53页。

② 黄月坡等:《中外条约汇编》,第131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2,第46页。

④ 同上,卷15,第32页。

⑤ 同上,卷82,第46页下或《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⑥ 薛福成:《乙丑上曾侯相书》,《庸庵文外编》。

教案”前,三年中,容闳多次向丁日昌提及留学计划,并请丁转呈曾国藩,均未奏效。显然,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主观上想派遣留学生,只是担心条件不成熟,流弊太多。说穿了就是害怕遭到舆论的攻击。

他们对内为一国重臣,对外为国家代表,他们的言行不但不能违背圣贤之道,而且还要事事以成法为典范。例如曾国藩,他在北京做侍郎时,曾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可是,身为显要以后,再也不谈此事。据张之洞的解释是“恐为时贤所诟病也”^①。由此可看出,他们既不能不讲洋务,又不能不受传统的约束。他们与那些顽固不化的“清流”势力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重辱之下,也能爆发出“卧薪尝胆之志”^②,而后者则依旧死守着祖宗留下的遗产,不思振作,但前者每前进一步,也都是被迫的,而且在压力不够大时,其前进的步子也不会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廷又沉睡了20年,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天朝神威丧失殆尽,才有“借法自强”。所以,从1860年到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前,10年过去,中国留学计划仍是纸上谈兵。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给予清王朝极大震动。迫使清政府把派遣留学生提到实践的日程。正是天津教案又一次给清朝廷带来的巨大压力,才终于冲破了“夷夏之防”,成为留学生走出国门的突破口。正像容闳说的,“‘天津教案’的结果使中国国家蒙极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③

最后,容闳本身具备的条件也是促成朝廷旨准派遣留学生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203,劝学篇二,第19页,《变法第七》。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2页,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奕訢等奏。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页。

的最关键因素。容闳是曾国藩亲自识拔之人,多年来殚精竭虑地帮办洋务,从曾国藩保举容闳的奏折中可见他对容闳的倚重。“该员前在花旗居处甚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三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①可见,容闳不仅肩负带领留学生出国的监督重任,而且还负有“联外交而窥秘钥”之责。

综上所述,派遣留学生已成为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容闳的个人努力则成为强力催化剂,大大缩短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进程。如果把借法自强比作派遣留学生的产妇,那么容闳则起着催生助产的作用。事实上,从容闳催生出来的留美幼童的整个命运来看,他们确实是“早产儿”。另外,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想法的似乎不以容闳为最早,但是,魂梦不忘的教育计划早在容闳留美期间即孕育而成,并把这计划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可叹的是,容闳回国后多年,一直没有发言权利,如果他不结识曾国藩,不在正统社会取得一席之地,不取得曾国藩等洋务大僚的倚重,那么,就不会有“天津教案”后的幼童留美之举。中国派遣留学生,还不知道要往后拖多少年。因此说,具体创议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功在容闳,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为派遣留学生代表着洋务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发展,因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事业^②。以奕訢为首的清朝主政者在洋务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终于勇敢地突破了“华夷之辨”观念,向“夷狄”国家派出了留学

^①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摺,《洋务运动》(二)第157页。

^②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生,干了一件“古来未有之事”。事实上,在整个派遣留学生筹备过程中,便看得出洋务大僚曾对留学生之事的重视程度。奕訢在朝廷予以赞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地方全力支持和实际经办,上下通力合作,使从未经历过的留学筹备工作进展得异常迅速。从呈请到批准,时间不过数月,再从筹备到首批出洋,也不过一年多。其行动之快,这在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晚清官场,可称得上是奇迹。另外,在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清政府不惜巨资,以培养人才,“虽难不惮,虽费不惜”,“勿使缺乏”^①,坚决保证留学生费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首批出洋学生的重望已溢于言表。

中国少数杰出人物,终于在“华夷之辨”壁垒上凿出一个缺口,向西方送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去探求西方富强之奥秘。然而“华夷之辨”壁垒依然存在,因为一个小小的缺口,并不能说明封闭保守的文化中心观的消失。事实正是这样:幼童派出去了,又担心他们会“美化”或成为“洋鬼”,结果于1881年将他们作为“罪犯”中途撤回。容闳也在中国驻美出洋肄业局的位置上处处受到攻击,国内守旧势力也始终认为容闳“不免欺罔浮冒也”,^②并终不为中国政府信赖,最终不得不远托异国、满怀忧虑伤感,直至埋骨海角天涯之命运。

① 《洋务运动》(二),第155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132页。